

呼唤柔性

——汉语语法探异

● 史有为 著 ●

TO CALL FOR FLEXIBILITY——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GRAMMAR

● 海南出版社 ●

呼唤柔性
——汉语语法探异

To Call for Flexibility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Grammar

史有为 著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03号

呼唤柔性——汉语语法探异

史有为 著

责任编辑：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85千 印数：2,000

标准书号：ISBN 7—80590—109—0/H·1

定价：7.50元

序

胡明扬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研究从1898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到今天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中国的语法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已经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和西方语法研究的历史相比毕竟太短了，汉语语法的不少基本语言事实还来不及进行穷尽的描写，符合汉语特点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待探索。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从理论、方法到体系都是借鉴西方的，而西方语法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却不完全适合汉语的实际，始终令人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如果说汉语语法研究还不能满足现代社会语言教学和语言应用的客观需要，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的语法学家在研究汉语语法的过程中，借鉴了西方语法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但也不是简单的模仿和抄袭，要那样说就不公允了。中国的语法学家在不同时期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断有所创新，偶而也有重大的理论上的建树，不过从总的来看始终没有跳出西方语法的圈子。不少有识之士不满足于这种状况，在四十年代展开了一场文法

革新大论争，在五十年代展开了一场关于词类和主宾语问题的大论争，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又展开了一次析句方法的论争。这几次论争使汉语语法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不断有新的收获。但是也应该看到，每一次论争都是在西方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仍然没有跳出西方语法理论和方法的圈子。西方语法研究在五十年代以后发展很快。结构主义描写语法一统天下的主流派地位发生动摇并很快让位给转换生成语法，不久功能语法兴起，其中哈里迪的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系统功能语法受到普遍注意。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又兴起了众多和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直接有关的语法流派，如格语法，蒙太古语法，词汇功能语法，广义短语结构语法，合一语法等等。这些五十年代以后在西方有重大影响的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近年来已在国内产生反响，因此新的论争看来是难以避免的，尽管这一次在性质上和前几次恐怕不会有多大原则性的区别。现在有不少青年语法学家在呼唤中国自己的语法理论和方法，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当前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呢？我认为汉语语法研究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不断深化。应该承认在语法研究领域内我们也是落后了，迎头赶上又有什么不好？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应该拒绝借鉴，而且只有在吸取了一门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最新成就以后才谈得上创新。一种完全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理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一定会脱颖而出，并且肯定同时会对世界范围的语法理论作出贡献，但是这样一

种理论也只有在吸取了世界范围内语法理论的最新成就并对汉语的语言事实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后才可能诞生。什么是理论现在似乎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似乎认为玄而又玄，常人难以理解，又难以验证的观点就是理论。我认为说到底理论是对客观事实的规律性的系统说明。理论必须能说明客观事实的潜在规律，可以用客观事实来验证，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理论。汉语语法研究毕竟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部分语言事实已经有了一定深度的研究，所以对个别问题进行理论概括，或据此进行理论上的演绎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因此任何理论上的探索都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受到非议。当然，任何理论最终都来自实践，理论探索不应该完全脱离对语言事实的研究，不从事具体研究的理论家是不存在的。古典力学的创始人牛顿是经过长期的具体研究以后才创立他的万有引力理论的，如果真的认为他只是悠闲地躺在苹果树底下而掉下来一只苹果就使他成为伟大的物理学理论家，那就要上大当。可是既要从事具体研究，又要熟悉世界范围内本学科最新的理论成就并结合汉语实际进行理论探索，那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可喜的是史有为同志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这部论文选就是既有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又有理论探讨，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词类和句子分析问题是语法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史有为同志在这两个问题上都不满足于现有的成说，都有自己的看法。在《词类：语言学的困惑》一文中，他对现有的

词类体系和词类标准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他认为语言现象是一种连续体，非此即彼的办法行不通。在中间地带最好用模糊语言学隶属度的方法来处理。他提的问题是有道理的，认为语言现象不能到处非此即彼也是对的。吕叔湘先生早就指出过，语言现象“是社会现象，跟物理现象不一样，不那么干净，整齐”，“有些现象是连续体，从高到低，从东到西，连绵不断，很难划出清楚的段落来，要划分就只能带三分武断。”（《扎扎实实做好语法研究》，载《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3页、4页）我想补充一点，划分词类不应该是为划分词类而划分词类，那样的话，分到最后会是一词一类，那样才无懈可击。不过，那样也就毫无意义了。任何分类都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不是为分类而分类。按原子量和化合价区分化学元素是为了便于说明化合规则，同样，划分词类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进行句法分析。因此，划分词类必须有利于句法分析，而决不能为句法分析设置障碍。把词类绝对化，不考虑句法分析的需要，那就违背了划分词类的初衷。不考虑是否有利于句法分析而把句法功能降到一个极不重要的位置上，单纯用鉴定词和鉴定格式的办法来划分词类，似乎很客观，很科学，事实上往往会陷于循环论证，因为初始标准是主观选定的，未经论证的。这样，即使得出了“客观”的类，如果给句法分析带来了难以解决的困难，那样的分类也就很少实用价值。划分词类事实上不得不带点实用主义的彩色，怎么分类有利于句法

分析就怎么分类，当然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这些客观标准也难免是主观选定的，不过有一个总目标管着，那就是词类必须为句法分析服务。分类是否合理首先要看分类是否合用。至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句法分析格局是否合理，又要看这样的句法分析能不能作出合理的语义解释，以及根据得出的语义解释能不能逆向生成基本相同的语句。一种句法分析格局和句法分析方法是否合理，是否正确，只能通过这种办法来检验，而一种分析方法内部的逻辑合理性并不能说明这种方法一定合理，一定正确。如果句法分析不考虑语义解释，也就无法通过生成来检验，那当然怎么分析都行，词类也相应地怎么划分都行，合理与否，正确与否都无法运用客观标准来检验，那就只剩下主观任意的评价了。

作者在《语言的多重性与层—核分析法》一文中的观点在当时很多人尖锐批判中心词分析法的时刻是一种不和谐音。他认为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都有道理，都有用。他提出了“向核关系”的概念，要把有人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分析法结合起来，称之为“层—核分析法”。史有为同志总有自己的看法，不愿意恪守家法，而是要冲破藩篱，时不时发出这类不和谐音，所以赢得了“怪球手”的美名。史有为之所以为史有为，史有为的研究之所以有价值，史有为的某些观点之所以受人重视，恰恰正在于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有冲破藩篱大胆探索的精神。现在大概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在句法分析中既不能不分层次，但也

不能不分主次。史有为同志当时的意见是比较妥善的。

史有为同志还很注意方法论问题。他不仅留意现代语言学在方法论方面的新趋向，而且还经常从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中汲取营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在《关于归纳和演绎、语法和语义》一文中关于归纳和演绎的辩证关系就讲得非常透彻。

史有为同志的研究大多是非常具体的，而且往往有新意。不论是发掘新的语言事实，还是摸索新的方法，还是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他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深深感到“语言系统是多面的，是开放的，是由系统性（有序）部分和非系统性（无序）部分构成的，而且它还是多侧面以及多层面互动、互作用的动态存在”，“语言中既存在离散的现象，又存在连续的现象，后者表现为模糊和混沌无序。”（《多元·柔性·主体》）据此，他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柔性”观念。他认为柔性处理“较之纯刚性的处理更符合语感，更加自然。”他这些论说大概可以称之为理论探索，所以泛泛而言中国语言学家“缺乏理论意识”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要建立一种系统的新理论是很不容易的，条件不成熟，功夫不到家，即使金苹果砸在脑门上也很难创建出一种新的理论来。

史有为同志近年来也很重视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学说。他还增加了一个语音平面。在语法研究中利用语音信息可以说由来已久。至于语音是不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平面当然还可以探讨。不过我倒以为还可以增加一个认

知平面。认知和语义是有密切联系的，但不是一回事。语义是有民族性的，而人类的认知过程和由此获得的知识系统基本上是一致的，民族差别在一个实用系统中是可以忽略的。另外，语义是语言形式的意义，而语言这种高效的交际工具却是十分简约的，在交际过程中实际上很多信息是由交际双方依靠共同的知识系统来补充的。我们平时对这一点很少觉察，但是在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自动理解过程中这一点就十分明显。使用汉语的人之所以不会把“吃馆子”误解为“用嘴把饭馆吃下去”而理解为“到饭馆去吃饭”并不是因为有关的语汇意义和句法结构意义告诉他应该这样去理解，而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系统提供的信息认为这样的语汇和句法结构传递的常规信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接受的，必须作出非常规的解释，而我们的知识系统又认定在“吃”和“馆子”的联结点上只有“到饭馆去吃饭”才是最可能的正确解释，如果语境提供的信息也支持这种理解，那么这样的理解就终于成立。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联想和推理过程，而且还必须通过交际实践的认可才能最后确定下来。在对人类的认知过程和知识系统还没有认识清楚，还没有一个形式化的系统可供检索的时候，这一类非常规的语义解释不妨暂时作为习惯用法由词典去处理，但是从长远来看，对认知过程和知识系统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全面研究语言就需要包括认知平面，因为人理解自然语言依靠的首先是语言形式和相应的语义，这两部分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这大致相当于语法平

面和语义平面；其次是语境，这相当于语用平面；最后是交际双方共有的全部知识，这相当于认知平面。国外现在已经有人试图从认知角度去研究汉语语法，知识系统的形成和知识库的建立也早已着手，看来再想把认知平面的研究排除在外已经是不大可能了。

史有为同志的论点绝大多数我是赞同的，也是很欣赏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我和他的表达方式和措词有所不同而已。他这部论文选集的出版是一件太好事，可以让更多的同行了解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他只尊重事实，很少条条框框，思想解放，观点新颖而又作风踏实，他的这些论文对读者一定会有不少启发，对推动和深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一定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1992年2月15日于北京

自序

呼唤柔性 走向柔性

我历来持如是观点：大凡在历史上有大影响或持久影响的学说必含有合理可取的因素，也必有片面疏漏之处。因此，我不主张绝对赞成或绝对反对某一学说。再好的学说都是可以、也应当怀疑的，所谓批判地吸收就是此意，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从我步入大学至今，这一观点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而这一态度又影响着我学术道路的选择。在北大读书听课的难忘岁月里，我饱受朱德熙师的学术思想的熏陶，在参加《现代汉语八百词》的编写过程中，我有幸在吕叔湘师的指导下学步；而在教书答疑写作的实践中，我又不得不面对众多的学说、众多的选择。这一切使我越益强烈地感到必须探寻不同学说合理因素的汇合点或结合点，而不能简单地取此弃彼，痛快了事。从这里开始，我便甘愿冒失败的风险，踏上自己选定的道路，摸索着，试探着，去寻找那尚不知晓的汇合点或结合点，寻找一种新的学术境界。而这一努力的最初成果便是《语言的多重性与层—核分析法》。它是我将不同学说的合理因素加以汇合或结合的最初尝试，其中的一些思想一直贯穿至今。为此，我曾反反复复地问自己：做得对吗？站得住吗？要不要回头？而我一次又一次地坚定自己、鼓励自己：不要怕，不要回头，因为你言之成理。在几经挫折、几经成功试验之后，原先朦胧模糊的形象渐渐地、渐渐地凝聚了，明晰了。我理解了：所谓的汇合点或结合点不过是主体对

客体性质的一种复式诠释，是一种主体的语言观和语言处理观。我寻找的，呼唤的那形象本是一种观念。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突然发觉，那观念就站在我面前，那就是“柔性”！千呼万唤的“柔性”！语言的开放性，语言的连续性、模糊性、混沌性，语言的非系统性，语言的多重性、多维性，不都是“柔性”吗？它们恰是与近现代语言学的“刚性”观念相对的。此时，我真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

我必须感谢当代自然科学与横断科学对我的启发与营养。正是光的“波一粒”二重性这一历经长期争论而最后汇合统一的学说启发了我，支持了我，使我写出《语言的多重性与层一核分析法》。正是系统科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模糊理论、非系统性或偶然性的理论支持了我对“大语法”的设想，支持了我对语言中非线性加合现象、混沌现象、中间现象的思考，并最终支持我走向柔性。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语言学的新方法一般不可能在其自身中找到。同时我也深信：在掌握事实之后，重要的是观念，而新的观念同样也一般不可能从语言学自身中产生。

我也必须感谢历史。历史的回顾总是有益的。温故而知新，回顾往往会给人以新的启发，新的灵感，帮助确定今后的走向。九十三年前，《马氏文通》开辟了近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研究，开始结束中国传统的“语法”研究。五十年代末，中国大陆上冒着被批倒批臭的危险，又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研究，从此进一步告别了中国传统。如果将1898年作为界线，将此前此后加以比较，那么中国传统的“语法”研究与近现代意义上的语法研究在许多方面是大异其趣的。在我看来，前者重虚词，以虚词带起认

识全句的意义，用训诂式的方法，在自我把握的语境配合下，确定一个个语词（主要是虚词）个体的用法与意义，而并不企图归纳规则、构筑体系；后者则重词类、重语句结构，以系统比较、分布分析、转换生成等方法去追求规则的严整精密、体系的逻辑完整。前者趋柔，而后者趋刚。趋于柔者必无意排除主体；趋于刚者，必力求排斥主体。因此古今研究的不同从某一点上说正是柔与刚之不同。它们是对立的。然而这只是大体而言。在我的师辈中，许多位兼通新学与旧学，在新学的语言研究中总不免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旧学传统的气息，显出刚中有柔。他们各自找到了汇合点或结合点，尽管不都自觉。今天，回顾历史，我们难道不能在自觉的基础上，在新的科学条件下重新汇合或结合吗？这正是我力图所做的。这里的“柔性”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近现代语言学成果基础上，用当代科学观念重新塑造了的“柔性”。它在科学系统的衡度上自觉调控着限制着人所渗入的主体因素。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对科学主义或对人文学都坚持着清醒的态度，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它要求汇合理，而决不否定一切。它应该是融刚于柔，形神兼备的。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放在读者面前的是我第一本语法论文选集（从40余篇论文中选出20篇，另有附编4篇），同时也是一本涉及现代汉语语法各领域的带有系统性的语法专论。这本集子是对我在语法领域里迈出关键一步的小结，同时又意味着新一轮探寻的开始。它表达了我对科学——一个不断逼近客观而又永无终极的过程——的理解，表达了我的语言观和语言处理观，表达了我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我并不认为

中的书一切都是完美的，不可修正的，因为这些文字只是反映了一个探寻柔性、走向柔性的渐次过程。在从刚性处理向柔性处理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文字风格的变化。如果个别文章为了追求刚性形式而丧失一些可读性，那我只能在此向读者致歉，请读者原谅这种早期风格。我也不要求读者都同意论文中所有的具体分析，但是如果读者能在其中获得一些观念上的启发，那我便感到已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

在此，我得特别感谢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明扬教授对这本集子的热情支持，承他欣然为本书作了长序，深化了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关于语法研究还应增加认知平面，关于分类应以句法分析为目的，而句法分析又必须考虑语义解释的论述），使笔者更坚定了探索柔性的决心。此外，我还必须感谢海南出版社能给我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机会，必须感谢李升召先生为此书的编辑出版所付出的心血。

史有为

一九九一年夏末

于日耕草舍

目 录

序.....	胡明扬作(1)
自序 呼唤柔性 走向柔性.....	(9)
首编 在语素和词之间	
一 划分词的普遍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	(1)
附 试论成词语素与不成词语素的区分(李升召作).....	(24)
次编 令人困惑的词类	
一 关于名词和处所词的转化.....	(38)
二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琐议.....	(41)
三 汉语连词的功能、界限和位置.....	(50)
四 词类:语言学的困惑——相对性词类模式试探.....	(75)
三编 结构和句型的刚与柔	
一 说“哪儿上的”及其“的”.....	(90)
二 续“说“哪儿上的”及其“的” ——表已然义“的”补议.....	(111)
三 关于“动+有”.....	(122)
四 包装义动词及其有关句型.....	(136)
五 紧缩句句型三种.....	(153)
六 一种口语句子模式的再探讨 ——“倒装”、“易位”、“重复”、“追补”合议.....	(161)
七 混沌性:“我喜欢他老实”.....	(179)
八 句型的要素、变体和价值.....	(191)
四编 扑朔迷离的语义、语用和语外因素	
一 位置义试探.....	(213)

二	施事的分化与理解.....	(230)
三	语用表述系统：本述和近述.....	(244)
四	相对形式的产生、发展与接受.....	(256)

末编 在继承基础上探索柔性理论

一	语言的多重性与层—核分析法.....	(268)
二	关于归纳和演绎，语法和语义.....	(283)
三	语言研究方法的制约因素及非传统思考.....	(298)
四	语言研究中的柔性观念.....	(311)

附编 中国语言学挑战与应对

一	中国语言学的危机与挑战.....	(318)
二	新时期中国语言学的应对.....	(323)
三	中国气派·北京气派·青年气派.....	(330)
四	多元·柔性·主体.....	(333)
	——80~90年代语法研究大势之我见.....	(333)
	著作目录.....	(344)
	作者简历.....	(349)
	英文目录.....	(350)